

二十一世紀評論

變遷中的國際秩序 I：美國與東亞

論恐怖襲擊後美國的世界態勢

時殷弘

急劇加劇的被威脅感和不安全感，是當今美國最普遍的情緒或心態，也是對美國的世界態勢和對外政策走向最具影響力的心理動因。《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稱：這場第三次世界大戰將是我們——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自由社會、自由市場和西方價值觀的根本象徵——同所有被賦予超級能量的憤怒的男男女女交戰。

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以下簡稱「九一一事件」)以其突如其來的發生方式、空前慘烈的殺傷後果和對所有道德倫理的絕然踐踏，使美利堅民族遭受了史無前例、異常深刻的心理衝擊。對美國人來說，由於超級大國地位而很少體會到的虛弱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強烈，由於首屈一指的經濟、技術和軍事實力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帶給美國人的安全感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脆弱。如果考慮到此次事件的大規模殘殺無辜平民的恐怖主義性質，並且考慮到美國人在冷戰結束和海灣戰爭勝利後的自滿自得，大概可以說，甚至60年前的珍珠港襲擊也未能造成那麼大的心理震動和強烈憤怒。美國對此次事件的定義——「戰爭行動」，最概括、最強烈地表現了這一點。

急劇加劇的被威脅感和不安全感，顯然是當今美國最普遍的一種情緒或心態，也是對美國的世界態勢和對外政策走向最具影響力的一項心理動因。《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不能不被認為有相當的代表性，其中將美國行將進行的反恐怖主義戰爭稱為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場第三次世界大戰不是使我們同另一個超級大國拼搏，而是使我們——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自由社會、自由市場和西方價值觀的根本象徵——同所有被賦予超級能量的憤怒的男男女女交戰」。特別由於「九一一事件」的大規模恐怖主義性質，連同一種早已有之、於今為烈的有時是過頭的意識，即這個世界上存在許許多多仇視美國權勢乃至美國價值觀體系、樂意看到美國遭殃和衰敗的人。可以說，美利堅民族產生了一種受困心理，多少覺得除了薩達姆(Saddam Hussein)之類公開的敵人外，世界上(甚至在美國國內)可能到處潛藏着對美國的威脅，而且這些威脅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難以明察、難以預防和對美國普通人來說致命的。國際社會對「九一一事件」的一致強烈譴責，美國就打擊恐怖主義得到的非常廣泛的國際支持和合作，只能在相當有限的程度上緩解美國人的這種受困心理。

不僅對美國人，某種意義上也對許多其他國家人民來說大有驚世駭俗意味的是，雖然西方、特別是美國政論界、對外政策思想界乃至美國政府至少十多年來大談恐怖主義問題，將其當作當代世界最重要的「全球性問題」（或曰「非傳統威脅」）之一，美國本土居民和海外人員先前也遭受過多次恐怖主義襲擊，但這次大規模慘劇仍然完全超出哪怕是最重視恐怖主義問題的那些人士的想像，更不用說超出美國政府任何已有的預防或應變措施所及。在此情況下，受到「九一一事件」巨大打擊之後的美國人，其被威脅感難免急劇膨脹，而且大概更加難免深感遭受威脅和不安全的人時常會產生的、可以理解的一種傾向，即過度驚恐、過度疑懼，以及由此而來對世界的看法過度簡單化。

來自美國的一切信息都表明，美國人已在悲傷、驚恐的同時，下決心在復仇之外，要全力捍衛和加強自己的被發現很不牢靠的安全，包括：

一、支持或推動政府以比先前打擊恐怖主義的任何時候都大得多的規模、力度和手段選擇範圍，連同大大超過越戰結束以來承擔自身資源和生命代價的意願，對它認定或指控的恐怖主義勢力進行猛烈的軍事打擊。

二、行將指向阿富汗（或許還有其他某些地方）的打擊，不僅如一般中國人一開始就預料的那樣必不可免，而且會像這裏許多人還未明確意識到的那樣一定會打到底，即不至少粉碎目前被認為主要的恐怖主義組織**對美國發動較大規模恐怖襲擊的能力**就絕不收兵。恐怖主義者行蹤難覓，宗教狂熱者藐視死亡，阿富汗地形不利常規作戰……，所有這些以及其他事實不應當使得觀察家高估美國打擊對象的抵抗能力。要能夠對美國發動較大規模的恐怖襲擊，一般需要一個足夠精細、複雜和足夠規模的恐怖主義「戰略能力網絡」，而這樣的網絡越是如此，它相對來說就越脆弱。另外，當前的恐怖主義勢力即使有宗教狂熱這一精神支撐，也大概會像絕大多數精神運動一樣，有其「疲勞極限」。

三、傾向於容許、甚至樂意為預防和打擊恐怖主義勢力而多少限制公民自由，減少社會的自由和開放程度，增大一向對其干預心懷戒備和反感的美國政府的社會控制權，增大總統及其行政部門的對內對外權力——一句話，容許甚或樂意在一定程度上以減少自由為代價來換取安全。

四、廣泛和強有力地支持大大增加廣義的防務預算，其中既包括至少在短時間內將「有求必應」的軍事打擊（「戰爭」）費用，也包括大大加強為在美國國內預防、清查和掃蕩恐怖主義的「國內安全」支出，還包括為獲取必要的反恐怖主義國際合作而不能不開銷的有關的外援資金，外加為使美國整個國家安全機器適應防備對付恐怖主義襲擊這一頭等任務所必需要耗費的巨量資源。

五、由政府盡快通過外交活動，包括外交協商、許諾酬賞和示意威脅，構建一個美國主持的全球反恐怖主義國際體制，在其中各國須接受主要由美國倡議的原則、規範、規則和程序，承擔多半由美國規定的盡可能具體的義務，而在美國人看來，各國的國家主權、特殊觀念和「局部」利益，決不能成為美國預防和報復恐怖襲擊、打擊美國認定的恐怖主義組織及其支持者的不可逾越的障礙。**值得注意的是**，國務卿鮑威爾（Colin Powell）在近來的談話中，可以說宣布

美國政府正通過外交活動構建一個美國主持的全球反恐怖主義國際體制，在其中各國須接受主要由美國倡議的原則、規範、規則和程序，承擔多半由美國規定的盡可能具體的義務。值得注意的是，國務卿鮑威爾在近來的談話中，宣布了可以稱之為「鮑威爾主義」的美國對外政策。

了美國為這一全球體制規定的兩條根本的、不能不認為富含霸權主義可能性的原則——可以稱之為「鮑威爾主義」的美國對外政策在理論上的新的基本信條：

(1) 美國將以一個國家對恐怖主義的態度和是否(向美國)提供反恐怖主義合作來決定對該國的態度；(2) 美國要在世界上發現恐怖主義的一切地方打擊恐怖主義。用布什(George W. Bush)在對國會演說中的話說：「要麼站在美國一邊，要麼站在恐怖主義一邊。」

六、以長期性地準備對付所有可以想像的突然襲擊(儘管首先是來源不明的襲擊者的突然襲擊)為重點，調整、改造和加強整個國家安全／防務機器，連同有關的國防理論、軍事信條、戰略規劃、戰略能力等等，它們突然被極為有力地證明頗大程度上不管用，或至少在一些大重要方面幾乎完全不切時宜。雖然這一調整、改造和加強需要經年累月的努力和大得難以預計的巨量金錢，但可以說美國人決心已下，並且有能力支付所需的資源。正如一位美國政論家在9月16日就此所說(它應當被認為表達了大多數美國人都很容易產生的一種想法)：「我們處於戰爭中。戰爭改變一切」。

七、在加劇了的總的被威脅感和不安全感影響下，將近乎一致地原則上支持國家導彈防禦(一位美國國會參議員稱：「說因為昨天的襲擊來自這個方向、那麼明天的襲擊就不可能來自另一個方向，是愚蠢的。」)。儘管由於「九一一事件」的教訓，這兩項計劃已沒有可能被當作準備對付突然襲擊的唯一、或者退一步說最優先的防務系統重大創新與投資項目。

對世界上許多國家和人民來說，需要特別地關注和心存戒備的除了上述第五、六、七項，還有一種難免的「溢出效應」，那就是美利堅民族被威脅感、不安全感的驟然加劇，可能重新激發或強化多少是不分青紅皂白的國際眼光，連同簡單粗糙的思想方法。而這可能會導致美國政府在處理帶有潛在衝突性的那部分國際關係時，總的來說傾向於更為強硬，對於一些同恐怖主義問題無關的安全和防務問題，產生或增強連帶的強烈防範心理。這樣的情況有如某個在一個方向上受到劇烈打擊的人(何況此人原本就對外部世界懷有某些過頭疑懼，並且不時草率判斷和情緒衝動)容易傾向於想像可能受到所有方向上的明槍暗箭，或者把一些並非嚴重的麻煩異常過敏地當作至關緊要的危害。考慮到布什政府眾所周知的鷹派色彩和單邊主義傾向，這一點就更應當予以提防。《遠東經濟評論》的一篇由多人合作完成的重頭文章強調：「甚至在(九一一)襲擊之前，華盛頓在布什總統領導下已改取鷹派方向，直截了當地支持台灣和對北朝鮮更為強硬。9月11日之後，這一姿態可能進一步強化。」另外，「這一悲劇是否支持了已在布什行政當局中佔上風的單邊主義者？許多人會爭辯應結束美國的單邊主義，以便有效地同其他國家合作打擊恐怖主義。然而，華盛頓將在國內壓力之下，不管有沒有區域協助都採取行動保護自己」。這樣的預計是頗有些道理的。

美國政府現在追求狹義和廣義相兼的對外政策目的。狹義目的指的是報復和打擊恐怖主義勢力，預防和力爭杜絕它們對美國的襲擊，廣義的目的則是獲取可以緊隨報復和打擊恐怖主義勢力而來的地緣政治意義上的副產品，連同可以因為大力主導構建全球反恐怖主義體制而得到的、組織國際體制和制訂國際規則的優

考慮到布什政府眾所周知的鷹派色彩和單邊主義傾向，今後對於一些同恐怖主義問題無關的安全和防務問題，產生或增強連帶的強烈防範心理的傾向將更為加強。美國政府現在既追求打擊恐怖主義勢力，也希望獲取可以緊隨報復和打擊恐怖主義勢力而來的地緣政治意義上的副產品，即有些學者所稱「制度霸權」意義上的附帶利益。

勢意義上的(即有些學者所稱「制度霸權」意義上的)附帶利益。即使美國政府有最為單純的動機，它在國際舞台上的大規模反恐怖主義行動也會多少造就這樣的副產品和附帶利益，何況歷史和常理都告訴人們，美國政府的意圖不會單純。

從戰略學角度看，美國現在的態勢同兩個基本問題相關：一是戰略目標的明確和集中程度，二是戰略能力供給的充裕程度。在不論其他因素的情況下，這兩項程度越高，戰略的有效性就越大。在「九一一事件」以前，如果足夠全面和耐心的話，便可以像本文作者曾做的那樣，對美國冷戰後對外政策決策作如下總的判斷：

無論是美國決策者，還是美國政府外的「精英」輿論，嚴格地說還遠未就美國全球戰略的方向形成大致的共識，或產生佔壓倒性優勢的主流意見；在有關的一些重大問題上，同樣尚無足夠明確、足夠堅定的政策和戰略……冷戰後世界政治的高度複雜性、分散性和流動性決定了美國不可能找到一個真正足夠強大、同時又足夠敵對的外部力量來當作舉國上下可以較為經久地「同仇敵愾」的對象，從而決定性地簡化它自己的對外政策問題。

在「九一一事件」以後，這個判斷不那麼適用了，至少在未來可相當明確地預見的一段時間內是如此。美國現在突然有了一個「舉國上下可以較為經久地同仇敵愾的對象」，那就是跨國恐怖主義。美國終於有了一個明確和集中的大戰略目標，而且被宣布是較持久的。戰略規劃、資源動員、力量調配以及政策行動效率由此得到的裨益不言而喻。

至於戰略能力的供給，就這一大戰略目標而言至少目前和最近的一段未來時間裏異常充裕，那特別是來自隨恐怖襲擊而來的美國國內公眾情緒和公眾輿論狀況，外加兩黨一致和對於打擊恐怖主義的異常廣泛的國際支持。最後，還有一項主要因大戰略目標變得明確、集中而來的戰略裨益：戰略調整變得比較便利，原先在這方面的很大一部分爭執、猶豫、迷茫、拖沓會由於「大敵當前」而被抑制或消滅，各局部的戰略安排一般將相當明確地受制於「九一一事件」所「強加」的新的戰略目標輕重緩急次序。事實上，這也是人們在歷史上一場戰爭開頭時往往可見的國家戰略行為方式圖景。

在既堅決反對恐怖主義、也提防霸權主義之外，所有持這兩大原則的國家和人民現在思考局勢和規劃對策還要有兩個基本出發點：第一，美國人現在處於舉國上下悲傷、憤怒的「國殤」時節，具有某種「哀兵」般的精神優勢；第二，美國人確定自己業已處於戰爭狀態。他們現在的被威脅感、他們採取非常措施和非常政策的決心、他們為此支出巨量資源的意願已非同尋常。不僅如此，他們至少眼下處於對追求其狹義和廣義相兼的對外目的而言異常有利的總體形勢之中。在這樣的情況下，必須以非同尋常的審慎來對待美國，設計和貫徹相應的態勢、政策和戰略。

「九一一事件」以後，美國突然有了一個「舉國上下可以較為經久地同仇敵愾的對象」，有了一個明確和集中的大戰略目標，那就是跨國恐怖主義。這樣，其戰略調整變得比較便利，原先的爭執、猶豫、迷茫、拖沓會由於「大敵當前」而被抑制或消滅。事實上，這也是人們在歷史上一場戰爭開頭時往往可見的國家戰略行為方式圖景。